

清史编年



第



卷

顺治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秦失其鹿，楚汉逐之。甲申年是中国历史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一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雄踞东北的清摄政王多尔衮采纳范文程『进取中原』之策，在与大顺政权的角逐中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金字蓝底的『大明门』横匾换成了满汉合璧的『大清门』。由服制发式等引发的汉民族抗争一直在书写着一六四四年以后的历史。正当明清鼎革行将完成、战争的尘埃行将落定时，万里之遥的西方正在改写着世界历史，率先步入近代的早期殖民势力已向古老的东方频频叩门。



清史编年

第一卷 顺治朝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本卷编写 史 松 林铁钧

清史编年

分卷目录



责任编辑：匡继先 林清秋 封面设计：朗朗书房·王莉芬 版式设计：张亦苏

《清史编年》编委会

编 委：戴 逸 史 松 成崇德
李文海 林铁钧 郭成康
黄兴涛
主 编：李文海
副主编：史 松 林铁钧 黄兴涛

序 言

郭影秋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要尽快地为前朝修史，使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得以世世代代地用文字记载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史料。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为“二十四史”之冠首。它详近略远，求真考信，记述了汉武帝以前中华民族的历史。全书“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无论从史学角度或是从文学角度，都给后人树立起一个治学的典范。《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断代史应该从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开始，以后又有范曄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至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名流学者，设馆撰修《晋书》等前朝历史，辅臣房玄龄、褚遂良以及名宿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均参与其事。唐太宗还亲自为晋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之二纪及陆机、王羲之的两传写了“制曰”，故《晋书》开卷即题“太宗文皇帝御撰”。这样，给前朝修史便成为历代开国的成规，开始了官修前朝史的先例。此后，宋修唐、五代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一朝接一朝，前后相继，修成了现存的“二十四史”，总括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为后世留

下了丰富的史料和经验。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宝库中，“二十四史”是一部相互接续、自成体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巨著。但是，以往各朝官修断代史，都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些史书中，贯穿着宿命论、循环论、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思想，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甚至在体例和取材上还有很多可议之处。诚然，它们不可能发现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4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至1927年编成初稿，命名《清史稿》。《清史稿》虽然搜辑排比了有清一代史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此书错误缺漏甚多，有的观点也极荒谬。作为民国的官修史书，仍把武昌起义称为“谋乱”，将革命党人失败牺牲谓之“伏诛”等等，根本违背了已经改变的社会现实。所以，《清史稿》刊行不久，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未能进入“正史”的行列。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重视历史研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为前朝修史，其目的和方法同历代修史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研究社会历史，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要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人们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时，明确地把研究历史，即“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当作了解中国国情，追溯渊

源，正确把握现实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无论从论文专著的发表出版，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或者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队伍的加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朝历史年代漫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在整理、归纳、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深入研究，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如果动员起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我确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完成编写《清史》这一光荣任务的。

清史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开始陆续出版。它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国传统的史书，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所有这些体裁，优缺点俱备，各有千秋，它们都以自己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例如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

《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地揭示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当然，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摸索，明显地取得上述

的这种效果，还须加倍努力，锲而不舍地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清史编年》依据之史料主要采自官书。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仅一部《清实录》即多达四千三百卷。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因此或者删节要害，或者粉饰真相，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官书史料齐备完整，时间较为准确，来源于档案文件，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借以辨别历史真象，充实丰富编年内容，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无论如何《清史编年》毕竟是历史科学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我祝愿它茁壮成长，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言

李文海

《清史编年》从1985年出版第一卷，到现在12卷全部出齐，由于诸多原因，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如果从开始组织力量编撰此书的1980年算起，则已经整整20年了。

20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老话：在历史长河里，20年时间只不过是转眼一瞬，套用我读小学时做作文常用的八股腔，真是“如白驹之过隙”；但对于个人来说，却占用了全部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还有另一层意思：用20年的时间搞一部书，在如今某些“倚马万言”、“一年可以出好几部著作的才子们，或那些善于抓住“商机”、个把月就可以编出一部什么“大全”之类的“攒书家”看来，一定会觉得不但迂得可笑而且傻得可怜。但是，历史上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编著一部书，其实倒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事情。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前后写了14年。班固的《汉书》，经过25年的努力始告完成。被后人誉为“史家绝作”的《资治通鉴》，写作过程历时19年。谈迁的《国榷》，由于经历了特别的坎坷，写作时间竟长达35年之久。这里我必须赶快申明，提到这些，丝毫没有要把这部《清史编年》挤进那些史学经典和学术巨著行列的意思，只不过是就时间论时间，从《清史编年》的经历生发出一点这

样那样的感慨。

编写《清史编年》的任务，最早是由我们敬爱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

《清史编年》编撰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原则，影秋同志在《序言》中已经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修订再版本将这篇《序言》列于卷首，同时重印了原书《凡例》，以便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

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

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清史编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诸多科研成果之一。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第一卷由史松、林铁钧负责编写；林敦奎、徐滨、向晓、罗远道、曹月堂、胡又环、陈洪等同志曾先后提供了参考资料。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铁钧、史松主编；陈洪、胡又环、罗远道、孙家骧、袁定中、向晓、曹月堂、徐滨等同志参加了编写。第四卷由史松主编；向晓、胡又环参加了编写。第五、六卷由郭成康编写。第七卷由林铁钧编写。第八卷由陈桦编写。第九卷由尹福庭编写。第十卷由杨东梁、谭绍兵、黎烈军编写。第十一卷由潘向明编写。第十二卷由迟云飞编写。

黄兴涛同志认真审阅了第六卷以后的各卷书稿，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孟超、刘仰东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没有他们的努力，这部书要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实在是极不容易的。

2000年2月25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凡 例

一、《清史编年》所采用之文献史料，经考核查对，均注明出处。凡未注出处者，即引自清代历朝实录。

二、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农历纪事，标明干支、公元，按年月日顺序逐条编撰，某些事件则集中归纳于一条或数条。

三、全书纪事以日期为基限，凡日之不能定者附于“是月”，月之不能定者附于“是春”、“是夏”等，春、夏又不能定者附于“是年”，年不能定者不记或作说明。

四、凡本书所用文献史料之来源、重要人物之简历、满文名称之汉译、说法迥异或存疑待考的重要史料以及充实正文的其他补充文献等，均酌情予以必要的注释。

五、为保存文献史料的完整及便于使用，本书较多地引用了原文。凡加引号者，除予以标点外，均保留原貌，不改一字。书中使用“谕”、“御”、“朕”、“敕”、“奏疏”、“得旨”等，乃沿用文献之术语。原文中对抗清力量和人民起义诬称“贼”、“寇”、“叛”、“逆”等词，已为读史者所熟知，一般未予改换。

六、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事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之设置、沿革、裁并，重要官员之任免升调罢革及品级变更等；主要典章制度，如世爵、礼仪、官制、兵制、赋役、税收、科举、刑名、漕运、驿递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如圈地、逃人法、迁海、垦荒、治河、开矿、鼓铸、贸易、水利、修路等，以及每年全国人丁户口、田亩、赋税、铸钱制钞等综合数字，均分别予以

归纳汇集，按时间记述。

七、民族关系为清王朝建立和巩固对全国统治的重要内容。凡满汉关系，清廷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交往，包括册封、朝觐、入贡、规章制度和双方之军事行动等，都予以记述。立国之初，独立于清朝之国内其他政权，记其主要活动。

八、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凡规模较大、影响甚广者皆记。确知其性质者，如农民阶级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武装行动，一般称为“起义”、“农民起义军”。不能确知其性质者称“起事”。

九、清朝统治者（包括宗室皇族）之活动，凡皇帝之即位、逝世及其他重要活动，包括政令之发布（如诏书、上谕、朱批、敕文）、出巡、亲征、狩猎、庆典、后妃册封以及宗室内部相互倾轧、继嗣斗争等，视其内容或详或略记之；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之爵位封袭降夺，择其重要者记之。

十、重要之政治事件（包括重大案件）及军事行动、其影响大历时长者，则详记其始末。重要学者之主要活动、重大科技发明创造、重要学术著作之完成、重要官书之编定、重大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等皆记。

十一、对外关系，凡使臣相互往来、贡赏、通商、交涉、订约、传教士来华以及抵御外国入侵活动等等，择其重要者记述。

十二、清历朝帝王，均书其年号，如顺治朝之福临称顺治帝，雍正朝之胤禛称雍正帝等；各地之南明政权，也记其年号，如南京之朱由崧称弘光帝，西南之朱由榔称永历帝等。

目 录

顺治元年	甲申	公元 1644 年		(1)
顺治二年	乙酉	公元 1645 年		(57)
顺治三年	丙戌	公元 1646 年		(115)
顺治四年	丁亥	公元 1647 年		(151)
顺治五年	戊子	公元 1648 年		(189)
顺治六年	己丑	公元 1649 年		(223)
顺治七年	庚寅	公元 1650 年		(255)
顺治八年	辛卯	公元 1651 年		(277)
顺治九年	壬辰	公元 1652 年		(319)
顺治十年	癸巳	公元 1653 年		(357)
顺治十一年	甲午	公元 1654 年		(397)
顺治十二年	乙未	公元 1655 年		(427)
顺治十三年	丙申	公元 1656 年		(457)
顺治十四年	丁酉	公元 1657 年		(489)
顺治十五年	戊戌	公元 1658 年		(517)
顺治十六年	己亥	公元 1659 年		(549)
顺治十七年	庚子	公元 1660 年		(579)
顺治十八年	辛丑	公元 1661 年		(613)

顺治元年 甲申 公元 1644 年

(明崇祯十七年)

正月初一日庚寅 (2月8日)

清廷在盛京 (今沈阳)。清顺治帝福临^①至堂子^②行礼，返宫，上殿受贺，命和硕礼亲王代善^③免拜。

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致书祝贺元旦。和硕睿亲王多尔袞^④对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⑤曰：朝鲜国王常以礼来馈，较诸王独厚，向

① 福临，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 (1638 年 3 月 15 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 (1643 年 9 月 21 日) 皇太极逝世，礼亲王代善会集诸王、贝勒等议，确立福临继位，以济尔哈朗、多尔袞辅理国政。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1643 年 10 月 8 日)，福临即皇帝位，是为清世祖，时年六岁，以次年 (公元 1644 年) 为顺治元年。

② 堂子，清代皇帝祭土谷神之所。“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 (昭槁：《啸亭杂录》卷八)。

③ 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太宗皇太极之兄。初封贝勒，天命元年 (1616 年)，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并封和硕贝勒。崇德元年 (1636 年) 晋封和硕礼亲王。

④ 多尔袞，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初封贝勒，崇德元年晋封和硕睿亲王。崇德六年因贻误军机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两佐领。崇德七年叙功复爵。

⑤ 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第六子，初封贝勒，崇德元年晋封和硕郑亲王。

曾奏闻先帝。今我等辅理国事，谊无私交，此等馈送，永行禁止如何？遂定议今后禁止诸王、贝勒收受外国馈送礼物。

本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①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造甲申历，铸永昌钱，定军制，平物价，减赋税，开科取士，增设官职^②。同时颁发讨明诏书，称：“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痼瘵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讐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许明帝归顺，将“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③

本日，明崇祯帝^④视朝，立班者仅锦衣卫一人，令鸣钟不

① 李自成，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父李守忠为官府养马户。李自成少时，习文能诗，有勇力，善骑射；及长，曾为驿卒，充里役。明天启末年，因岁饥聚众起义。崇祯二年投农民军闯王高迎祥，成为高部下的闯将。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被推为闯王。崇祯十三年冬，率军自商洛出河南，次年正月破河南府，纵横中原，远近归附。崇祯十五、十六年，连克湖广襄阳、承天、常德等府州县。崇祯十六年五月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设权将军、制将军等分统部众；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等官；于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县令，初具政权规模。同年十月克西安，陕西全省俱下。

② 据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载，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宋企郊等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尚书；置弘文馆、文谕院、尚契寺、验马寺、书写房等机构。设五等爵：封侯九人，有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鼎，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封伯七十二人，有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等；封子三十人；封男五十人。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补遗（1958年重印本，下同）。

④ 朱由检，明朝末代皇帝。光宗朱常洛第五子，熹宗朱由校之弟。明天启二年封信王。七年（1627年）继位，改元崇祯。

停，门勿闭，久之无至者。后虽至，但人心惊慌，朝班混乱^①。

初三日壬辰（2月10日）

刘宗敏、李过率大顺军二万为前锋，北上讨明。李自成统大军自禹门渡黄河，并移牒明朝兵部，相约决战。言将于三月初十日至京^②。

本日，明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言：“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帝曰：“朕有此志久矣”，“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此事不可轻泄。”^③

初五日甲午（2月12日）

清廷命甲喇章京^④沙尔虎达统兵征库尔喀部^⑤。

初十日己亥（2月17日）

清廷命梅勒章京^⑥李率泰统兵更戍锦州；遣来达哈巴图鲁等领兵永驻锦州。

本日，清廷派使臣偕达赖五世之专使，往迎达赖喇嘛^⑦，并以书谕厄鲁特蒙古顾实汗知之。

①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彭孙贻：《流寇志》卷九。

③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

④ 甲喇章京，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一千五百人。“章京”为“将军”之汉音。顺治八年定甲喇章京汉字为：“参领”。

⑤ 库尔喀，明代为海西女真之一部。

⑥ 梅勒章京，旗长之副职，顺治十七年定汉字为“副都统”。

⑦ 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天启二年（1622年）为第五世达赖喇嘛。崇祯十五年（1642年）达赖等派专使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抵盛京与清通好。